

《庄子解读》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陈鼓应 林光华 撰

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庄子解读

陈鼓应 林光华 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庄子解读/陈鼓应, 林光华撰.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4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19131-7

I. ①庄… II. ①陈…②林… III. ①道家②《庄子》-研究 IV. ①B223.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9652 号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庄子解读

陈鼓应 林光华 撰

Zhuangzi Jied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770(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8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27 00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纪宝成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学院的基本建设工程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国学院，被誉为顺应历史潮流、立德立功之举，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得到了各界的支持。我校已经在国学教育方面先行一步，更应该具备一种担纲意识，继续为推动国学教育向纵深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编写这套教材，不仅仅是为了适应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的基本需要，也是力图振兴我国经典教育的一个具体步骤。经典著作如同岁月长河积淀、打磨出来的珍珠，在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自先秦以来，儒道法墨诸家所奠定的经典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形态，在两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进一步得到巩固与发展，形成了专门的学问与学科，是国学的主体。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乃是广义上的经典，不仅有儒家的经书，而且包括诸子与史部、集部的群书，它是中华文化与学术的集成和荟萃。至于其地位与作用，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这段话说明中国古代的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精华，其精神意蕴可以穿越时空而获得传承与光大。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读经的传统，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年间曾经废止读经，但这并不等于经典教育的废除，相反，它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创造性地继承与更新。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所说：“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

这实在是一种进步。”这种看法显然是通达和正确的，值得今人加以借鉴。今天我们编写这套教材，也同样是为了更好地对学生进行经典学术教育，而绝不是简单地恢复读经。

国学的精华主要凝聚在经史子集四部的经典之中。“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和顺序是在《隋书·经籍志》中最后确定下来的。后来清代乾隆皇帝时编修《四库全书》，也是按经史子集四部来整理和编修的。四部不光是目录学的概念，而且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一般说来，经部、子部大略相当于现在的哲学学科，史部大略相当于历史学科，而集部接近于现代的文学学科，这说明国学与现代学科分类是可以互相兼容的，并不存在水火不相容的问题，当年的北大国学门与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是将四部与现代学科互相融合的。因此，传统经典教育与现代教育可以相得益彰，和谐相生。

不过，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学术重视不够，再加上厚今薄古思想及其理解中存在的偏颇，国学并没有在百年来的教育体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到整体上的打压。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学与国学教育在社会各界倡导下，有了长足的发展。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加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强调尊重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随着整个中华民族复兴之局的到来，国学走向振兴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们所说的国学，是指运用现代立场与眼光、放在国际视野中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一门学问。它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是传统学术的内容；其二是用现代眼光来阐释、辨析与创新，是今人眼中的国学；其三把国学看做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来阐释、比较、辨析与创新，是国际视野中的国学。因此，振兴国学不仅是指光大传统，更主要是指激活国学的现代价值和创新精神，国学内在的融合中外、推陈出新的精神与能力，是我们今天在建构和谐社会，进行文化创新时所要秉承的。对于传统经典的解读、阐释与辨析，毫无疑问是对于这种理论创新能力的激活，国学的生命力也在这种创新中得以生生不息，走向未来。因此，在国学教育中，这种经典的研读、阐释与辨析，是最要紧的门径之一。

中华经典相对于世界各国的文化特质来说，属于一种世俗文化，与世界其他各国的经典多属神学系统大不相同。比如，《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与学生思想观念的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充满着世俗人情的意味。再比如《庄子》这本书，也很关注通俗的演绎。因此，认为经典高不

可攀的看法并不准确。不过，经典毕竟是经典。唐人编的《艺文类聚》对于经典的解释是“经也者，径也，言五路无所不通”，也就是说，经典承载着普适性道理，好比通向各条路径的通衢一样，它必然会去掉那些浮浅的东西，提升为哲理，有的在形态上不可能不深奥，如《周易》与《老子》这一类经典。因此，需要做一些解读与注释的工作。历来对于经典多有注释与解读，乃至形成了专门的学问。

经典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早在上个世纪中叶，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就指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程度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几年，以《论语》、《庄子》等为代表的国学经典，通过现代传媒的推介与个体阅读，在国民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便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它也证明，国学经典教育在今天的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学方案中，经典教学类的课程占有很大比重，这也是它与现代文史哲专业教学的一个不同之处与亮点所在。为了满足国学院的教学需要，同时也为了顺应向海内外重张国学经典教育的时代大潮，我们编写出版了这套“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这套教材的学术定位，绝不是一般的教材，而是追求具有深厚学术底蕴，深入浅出，明快易读，从而履行中国人民大学追求一流、服务大众的职责。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编写体例上，我们要求体现出“国学经典解读”的宗旨。虽然古往今来，关于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类书籍浩如烟海，不胜枚举，但是以国学的精神与方法去解读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本系列教材集中从国学的角度去对传统经典进行解读，具体而言，就是立足于当代人文视野，贯彻义理、文章与考据融为一体的精神，打通现代文史哲三科的中间环节，通过解读与讲授，培养学生从经典中掌握国学知识，领会国学精神，提高治学能力，从而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关于选择范围，有的是全本，有的则是选本，选本要求依据编写指导思想在字数范围内选择优秀的代表性篇目。

篇目注释与解读，是本套教材的重点所在，它由两部分组成：注释时力求准确严谨，同时行文上明快易懂。全篇解读则力求从传统经典中开掘出国学基本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在知识与精神方面获

得提升。所选书目，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学方案来选定。书的编注者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师为主，部分作者则为在国学院任教的人大其他学院的教师，同时也邀请到其他高校和科研部门的一些学者参与这项工作。这些教师在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同时，倾心编注了这套教材，表现出对国学教育事业的热忱和投入。

本丛书已列入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重大攻关项目，得到项目资金的支持。这对编好出好这套丛书，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重振国学、弘扬国学方面所持的态度、立场和支持力度。

这套教材的编写，如同人大国学院其他工作一样，均具有筚路蓝缕的探索性质，尽管我们已在主观上尽了自己的努力，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仍不可避免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因此，我们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使这套丛书在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共同推进国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是为序。

2008年6月

编写说明

第一，经文版本

本书以中华书局 1998 年出版的郭象《南华真经注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本为经文底本，分段与标点有细微改动。以中华书局 2011 年出版的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最新修订重排本）为主要参考。由于篇幅所限，本书选取了内七篇及外、杂篇中颇具代表性的七篇进行解读。

第二，体例结构

本书各篇包括“经文”、“注释”、“译文”与“解读”四个部分。“注释”是对重点字句、难解字句的解释，“译文”是对经文的现代白话文转译，“解读”是对全篇结构及主题的分析与引申。

第三，编撰过程

本书自 2011 年 7 月开始撰写，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陈鼓应先生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林光华博士共同完成。本书主要参考了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2013 年 9 月由林光华博士完成初稿，经陈鼓应先生过目、修订，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付梓。

第四，行文格式

1. 本书所引用主要书目，均列于书后的“参考文献”部分。
2. 本书“注释”部分的郭象、成玄英注疏因频繁出现，出处省略。
3. 本书凡重要的注疏及观点的说明见脚注。
4. 本书“注释”与“译文”部分，为便于理解而添加的词语一律放入括号中，相关的说明见脚注。不宜译为现代汉语且为人们熟知的经文词汇均保留原文，如“逍遥”、“天籁”。
5. 为行文简洁，本书正文部分一律省去“先生”尊称。

目 录

编写说明	1
------------	---

导 论	1
-----------	---

内 篇

逍遥游第一	21
齐物论第二	38
养生主第三	69
人间世第四	78
德充符第五	107
大宗师第六	124
应帝王第七	149

外篇（选读）

马蹄第九	163
天道第十三	170
秋水第十七	189
至乐第十八	212

杂篇（选读）

寓言第二十七	227
渔父第三十一	238
天下第三十三	251

参考文献	274
后 记	276

导 论

《庄子》是中国古老的哲学元典之一，与《老子》共同构成道家思想的主体。目前，海外有多种关于该书的译本在流传，国内也不断地掀起读庄的热潮。《庄子》在当代大学的人文讲台上始终不可或缺，民间相关的读书社也越来越多，这些都显示出这部经典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它不仅在历史上有过深远的影响，对当代文化的建构也有巨大作用。作为道家元典，它与儒家元典一样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性格、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方式，是我们今天了解自己、走向世界需要参考的宝贵资源。

本书是我们多年阅读《庄子》的产物，在书写上尽量平实易懂、深入浅出、贴近现实。我们在前人所作的大量注译、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主要篇章作了注释、翻译和解读。这里，先对《庄子》的总体面貌及主要思想作简单的介绍。

一、庄子：其人其书

庄子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的思想宏大深邃，源远流长，但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客观人物，其人其书的真实面貌我们却知之甚少。他的生卒年、故里以及该书究竟哪些出自其本人之手等重要问题，至今都没有完全考证清楚，争议性的说法很多。至于他的生平事迹、兴趣爱好、家族背景以及写作过程等等，史书留下的客观记录就更少了。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闾，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

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箝》，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①

由此可以确知的是，庄子名为庄周，战国时期人，很有学问，思想根植于老子，对孔子思想多有批评，其书以“寓言”为主，《渔父》、《盗跖》、《胠箝》三篇是他所作。此外，他淡泊名利、个性独特、终身不仕，过着简单的生活。但是，“蒙地”究竟是今天的哪里，他生活在战国时期的哪一时段，《渔父》等外、杂篇是否出自其本人之手等问题都很复杂。

关于庄子的故里蒙地，目前有两种最为主流的说法，一说属宋国，即今天的河南商丘境内；一说属楚国，即今天的安徽蒙城境内。^②

宋国说，有三个比较明显的古代文献证据：《史记·庄子列传索隐》说庄子乃“宋之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庄子名周，宋蒙县人”；《汉书·艺文志》班固说庄子“名周，宋人”。马叙伦在《庄子义证》之附录《庄子宋人考》中又提出两个有力的证据，一是《史记·宋世家》所据《左传·庄公十二年》的“宋万弑湣公于蒙泽”；一是《史记·宋世家索隐》所据庄子佚文：“桓侯行，未出城门，其前驱呼辟 [按：辟乃宋桓侯名字]，蒙人止之，后为狂也。”以上都证明了庄子是宋国人。当代持这一看法的学者相对比较多。

楚国说，始于宋代，多是从庄子的思想风格上来推断的。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中说：“庄子自是楚人……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还有很多学者认为其与屈原的风格有相似之处，譬如光怪陆离的想象、恣意放荡的笔法、意味隽永的隐喻。康中乾则认为：“庄子的文风有楚文化的特色，这确是实情。但不能因此就说庄子为楚人。”^③

① 司马迁：《史记》，第七册，2143~21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② 以下宋国说、楚国说的介绍参考康中乾：《从庄子到郭象——〈庄子〉与〈庄子注〉比较研究》，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另有庄子是齐人说、鲁人说等观点，参见崔大华：《庄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③ 康中乾：《从庄子到郭象——〈庄子〉与〈庄子注〉比较研究》，5页。

他的思考可谓冷静、严谨，毕竟风格相似的作品未必出于一地，关键还要看思想指向。杨义在《庄子还原》中则提出了一个比较中和的说法，他认为：“庄子为宋国蒙地人，但庄子思想上承老子，乃为楚学，多有楚人的文化基因。”^①书中有大量例证，说明庄子的祖脉在楚，其家族为楚庄王后裔，大约在楚悼王、肃王之际流亡于宋，所以他的思想、风格中都有楚文化的基因。庄子有楚国情结，时常流露故国之思。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根据：

1. 楚悼王死后，宗室发生暴乱，庄子家族受到牵连。从楚国北境到宋国有一条由墨者把守的通道，对于因吴起之变而逃亡的楚国公族，墨者会给予救济。庄氏的某一支可能通过这条道逃到宋国。

2. 庄子“其学无所不闻”，可见受过良好的教育。其能与侯王直接对话，楚王还专门派“大夫二人”请他去楚国做官，这说明庄子不是一般的平民，而很可能是“破落贵族后裔的身份”。

3. 《庄子》中描写的楚人多聪明、智慧、修养很高（如郢人运斤、汉阴丈人、佝偻承蜩等故事），而宋人则多鄙陋（如宋人资章甫而适越等故事）。

4. 《庄子》中流露出浓厚的思乡情结，如《徐无鬼》中的“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则阳》中的“旧国旧都，望之畅然”。

5. 《庄子》中诸多意象显示出楚民俗信仰，如《逍遥游》中的“鲲鹏”意象与楚人的“神鸟情结”有密切关联。^②

这些说法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庄子》的视角，但其中也或多或少有些推测的成分，并无铁证。总的来说，以上两种说法各有道理，至今还有很大的争论，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加，还有进一步考证的空间。其对我们理解《庄子》的哲理思想并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只是提供一个更好地理解《庄子》的背景。

关于生卒年，《史记》只说“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具体年份可能在司马迁的时代就已经模糊不清了，所以他没有具体说。目前学界比较一致认可的是马叙伦的考证结果，即庄子生于公元前369年（周烈王七年，即魏惠王二年、楚宣王元年），卒于公元前286年（周赧王二十九年）。^③

① 杨义：《庄子还原》，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② 同上书，15、17、19、21、24页。

③ 参见崔大华：《庄学研究》，5页；康中乾：《从庄子到郭象——〈庄子〉与〈庄子注〉比较研究》，2页。

《庄子》文本目前流行的是郭象本，共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一般认为，内七篇是庄子本人所著，代表庄子思想，写于战国中期。外、杂篇是庄子后学所著，不晚于战国末期，可能掺入了一些后代文字。刘笑敢在《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一书中对此作了严谨的考证。其概念方面的重要证据是：“内篇虽然用了道、德、命、精、神等词，但没有使用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由词根和词根合成的词），而在外、杂篇中，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都反复出现了。”^①例如，内七篇中“道”字出现四十二次，“德”字出现三十四次，但没有二字连用的“道德”一词，而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汉语词汇中首先出现的是单纯词，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复合词才逐步出现。这样的例子很多，因此刘笑敢断定内篇早于外、杂篇。当然，还有一些次要证据。

《庄子》内七篇为庄子本人所作，这一点基本没有什么争议。外、杂篇则比较复杂，因为其思想有与内篇抵牾之处，譬如最明显的是外、杂篇批评孔子的言论甚多，内七篇中则没有如此。但也有与内篇吻合的地方，譬如《秋水》中视野的不断开显与《逍遥游》中“鲲鹏”的逍遥境界、《齐物论》中“道通为一”的境界都是一致的。所以，很难说外、杂篇没有庄子的痕迹，有可能是庄子后学根据他的意思修改完成的，也有可能偶尔窜入一些另类的思想。刘笑敢在《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断定外、杂篇是庄子后学所作，并且将其分为“述庄派”、“无君派”与“黄老派”，具体内容如下：

“述庄派”以继承与阐发庄子思想为宗旨，对庄子的本根论、人生论以及方法论都有比较深入的演绎和发挥。与庄子不同的是，这一派的思想更为现实，并赋予其更多的合理性，例如把庄子“无心”、“无情”的主张用于现实目的。《达生》中“佝偻承蜩”、“梓庆为鐻”等故事都说明了这一点，它们不似内篇中庄子追求精神上的超越，而更多地思考如何将精神上的专一用到现实的成功中来。另外，这一派还提出了道家的“性超善恶论”，对道家人性论的建构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②

“无君派”对庄子思想作了很多重要的改造，激烈地抨击君权及仁义道德，强调因顺人性之自然，提出人性淳朴、没有剥削、万物平等的“至

^① 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26～2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② 参见上书，251页。

德之世”（《马蹄》），而不是逃到“无何有之乡”（《逍遥游》）。春秋战国时期，仁与义是儒墨显学所推崇的重要道德观念，这一派正是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于此。《骈拇》篇开宗明义便说：“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认为仁义是道德败落的结果，圣人标榜仁义不但无功，反而有过。仁义是重要的传统道德规范，无君派却把仁义与道德对立起来。^①

“黄老派”是庄子后学中年代较晚的一派，其思想与庄子相距最远。这一派吸收了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兼谈道德、仁义、法术，还提出了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这一派对儒、法思想的容含，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天道》篇。《天道》曰：“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这里明显容含了法家的刑名思想，又曰：“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这明显容含了儒家尊卑有序的思想。^②

由此可见，《庄子》三十三篇尤其外、杂篇的思想比较复杂，我们需要对出自庄子本人之手的内七篇有深刻、准确的理解，才能分辨出外、杂篇中哪些可能是庄子的思想，哪些可能是庄子后学发挥的思想，哪些可能是完全与庄子意图相悖的别派窜入的思想。同时这也提醒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把《庄子》三十三篇看成是一个逻辑谨严、内容一致、没有矛盾的哲学体系。毕竟我国古代书写哲学的方式与西方不同，其多用箴言、寓言，写作方式本身也荒诞诡谲，并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门下弟子的记录与传承。此外，古代也不像今天这样有版权意识，作品不受法律的保护，经文常常被任意更改，诠释者可以主观地加入自己的思想，并且还常常根据时代、现实的需要删修、整理。这些都导致了我们的识别孰为庄子本人所作所述的困难，但这不妨碍我们了解《庄子》的主旨，因为贯穿这部经典始终的主线、核心精神是清晰的。

二、《庄子》的主要概念与思想

对于《庄子》，古代最权威的注者郭象给予了极高的赞扬，称其“通

^① 参见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260页。

^② 参见上书，272~274页。

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绰，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可见，《庄子》内容非常丰富、高屋建瓴，触及到了人类的一些根本问题，其思想、风格放荡不羁，想象奇特，旨深意远，玄妙雅致。其后学亦这样描述《庄子》的思想、风格：

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倦？不以觴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矣。（《庄子·天下》）

《庄子》最为集中地表达了自由放达、浪漫不羁的思想，与之相匹配的写作手法也必定是光怪陆离、异乎时人的。这同时也使我们把握他的思想十分困难，但是其核心思想基本上都集中在内七篇中，而且庄子有自己独特的概念系统，这使我们可以从其核心概念入手来把握。庄子最重要的概念有五个：逍遥、齐物、养生、安命与真人，集中体现于《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与《大宗师》篇，下面分别概述。

1. 逍遥

逍遥概念出自《庄子》首篇《逍遥游》。“逍遥”是叠韵连语，又写作“消摇”。“消”是消释、排遣的意思，“摇”是动荡的意思，“游”是浮游的意思。^①从字义上看，是消减了一些东西，释放了一些东西，心灵才能游荡起来，享受真正的自由。这消减、释放，有老子“为道日损”（《老子》第四十八章）的味道，也就是要损掉一些东西，譬如功名利禄、情感欲望以及各种琐事引起的焦虑、不安。摇荡起来以至浮游于万物之上，也就是安闲自适、无为无虑、自由自在的状态。这便是“逍遥”最基本的意义。

在《逍遥游》中，庄子主要通过大鹏的意象来表达逍遥的深意，大鹏之所以能达到逍遥是因为它由鱼而化，大至千里，风起水涌之际借势而

^① 参见钟泰：《庄子发微》，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飞。庄子曰：“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需要内在的厚积之功（身体大），外在的绝佳时机（风势大），大鹏才能飞起来，这是有待逍遥。庄子又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最高的逍遥是无待逍遥，连各种积累与外力都不需要了，完全顺乎自然，这就是达到了“至人”、“神人”、“圣人”的境界。其中“神人”的形象最为经典，《逍遥游》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至今，我们还用“不食五谷杂粮”来形容精神超脱的人。其关键在于“神凝”二字，即专注的品格，这种专注又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目标明确的。

在《逍遥游》中，庄子还通过惠子认为无用的“大樗”来表达类似的思想。庄子对惠子说：“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其隐喻的是，在困苦的现实里，唯有在精神的逍遥中才能得到安慰与寄托。“彷徨乎无为其侧”说明逍遥本身就含有“无为”的意思。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妄为。《天运》亦曰：“以游逍遥之虚……逍遥，无为也。”在一个妄为的时代，“无为”不仅有对精神自由的诉求，也有对统治阶层的劝导。

“游”是对这种“逍遥”状态的集中概括与升华。“游”不是身体的游，而是“心”的游，要求人从“心”上做工夫。为此，庄子提出了“心斋”、“坐忘”、“虚静”、“以明”等各种修养工夫，劝导人在炎炎浊世保持心灵的平和、淡漠，去除是非得失的计较，克服生老病死的焦虑，甚至突破时空的界限，在精神的境域中任意翻飞。也正因为此，庄子思想被认为有隐逸情结、出世倾向。事实上，无论在什么时代，心灵的修养都至关重要，这是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志。如果人完全为物所役，为肉身的享受、财富的敛积而活，就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价值与意义。所以，庄子的逍遥思想不是消极的无所作为，而是可以穿越时代与当下对话的关于人之为人的思考。

2. 齐物

与逍遥相比，“齐物”思想更具有哲学意味，其集中体现于《齐物论》篇（其次还有《秋水》篇）。《齐物论》更多地是从哲学的层面展开说明，主要涉及我们看世界的视角问题。“齐物论”从大的范围来说是齐“物”，

即主张万物平等；从小的范围说是齐“物论”，即主张破除是非、打通彼此。^①“齐”有破除、超越、转化的意思，《齐物论》主要从“齐是非”、“齐语言”、“齐生死”、“齐美丑”等几个方面揭示“道通为一”的最高境界，说明站在道的高度才能看到万物一体、五彩缤纷、生机勃勃、价值多样的美好世界。

齐“物”的关键是齐“物论”，“物论”是关于万物的看法、观念，影响着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万物本是平等的，无所谓齐与不齐，但是人们习惯戴有色眼镜看问题，给物定标签、分等级，并且还因为观点不同而争辩不休。这“物”也包括社会思想，譬如社会的方向、人性的方向、主流的价值等等，人云亦云，各派之间难有共识。儒墨之争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也是庄子写《齐物论》的重要背景。所以，齐“物论”的关键是齐是非，齐是非的关键是齐语言。如果连语言都齐了，达到无言道境，关于生死、美丑等的争辩也就不存在了。

齐是非是“齐”的各种内容中最富思辨性的。庄子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他看到是非、生死、可与不可都是相互依存的，关键要看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上，在这个情境下“是”，在另一个情境下可能就成了“非”，没有绝对的标准。人从出生那一刻就开始走向死亡，生的过程也是死的过程，生死一而不可二。同样，在这个情境下可以的事，到了另一个情境可能就不可以了，纠缠于是非争辩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圣人“照之于天”。天即道，从道的高度看问题，就不会落入两端的争执中了。

齐是非的关键是齐语言。庄子对语言现象很早就进行了反思，他说：“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语言变幻不定，语言背后到底有什么固定的东西呢？与叽叽的“穀音”有什么不同呢？语言果真能建立起意义吗？道在语言中吗？顺着庄子，我们一下子就触及到了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滥觞于老子的“道不可说”的问题。庄子认为“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道不是不可说，而是被自以为是的“小成”所掩盖；言也不是没有实在内容，而是被浮华的语言所遮蔽。

^① 按：“齐物论”作为标题，有两种读法，一作“‘齐物’论”，一作“齐‘物论’”，本书认为二者并不矛盾。这里从王叔岷读法，作“‘齐物’论”，“齐物”连读，齐物即道的境界。详情参见王叔岷：《庄子校注》，上册，39~40页，台北，乐学书局，1999。